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绪 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有极为兴盛的体育活动，留下了丰富的体育史料和文物。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很长时期，由于对体育不够重视，很少有人把它的史料和文物进行整理，致使我国体育史的研究起步甚晚。1919年郭绍虞先生写了第一部《中国体育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关怀和重视下，1959年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体育史料整理工作。唐豪先生继郭绍虞先生之后，编辑了九本《中国体育史资料》。粉碎了“四人帮”，科学文化园地百花盛开，国家体委成立了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出版了《体育史料》和《体育文史》期刊。成都体育学院和北京体育学院相继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体育史》等专著，把体育史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体育”一词，是清朝末年维新运动时期从外文翻译而来的，我国古代没有与此意义相同的词语。我国古代体育的大部分项目，是军事训练的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部分项目是社会的娱乐活动，如杂技技巧、游泳弄潮、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毽子等；而导引、气功、按摩，则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由于体育运动本身具有多种的社会职能，其性质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根据社会不同时期的要求，表现了多种的社会功能。如摔跤、举重、狩猎、足球、马球等，虽然是练武的手段，但同时又是社会的娱乐活动，而且极为人们所喜爱。宋代调露子所写的《角力记》上说，蜀都每逢摔跤比赛，“观者如堵，巷无居人”。拔河、风筝，虽然是社会的娱乐活动，但据《隋书·地理志》和《新唐书·田悦传》，都曾被当作军事练武和侦察通讯之用。太极拳本来旨在健身，王宗岳《太极拳打手歌》中说它具有“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的击技功能。通过体育的实践活动，宋代人著的《蹴鞠谱》中，已经认识到踢球不只是娱乐，也能够“健体安身可美，喜笑化食堪夸，肥风瘦瘠都罢”。元代宁志老人所写的《丸经序》上也说，“拽肘运杖，击杓收窝，诚足以养其血脉，而怡怿平精神”。这些说明了，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体育一词，但各种体育项目活动，早已广泛地开展，并对它的多方面的社会职能也早已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汉代、唐代和宋代，体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各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和经济结构不同，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七雄并立，争战频繁；建立强大的军事武装，是各诸侯国的头等大事。因此，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体育项目，如射箭、举重、武艺、摔跤、田径、游泳等，都与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诸侯国君不仅用奖励赏赐等办法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还运用政府权力迫使人民练武。《荀子·议兵篇》中说，魏国选拔武卒，“日中而趋百里”，考试合格，“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墨子·尚贤》中说：“欲众其国之善射之士，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韩非子·内储说》载：“李悝为魏文侯上地太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这些措施当然能够极广泛地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

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医

学、生理学、养生学的研究，使体育锻炼理论有了新的提高。《荀子·天论》中说：“养备而时动，则天下能病。”《吕氏春秋·尽数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这些都已经认识到生命在于运动的真谛。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创造了导引、气功等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上都具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当时，体育项目的发展丰富而多彩，狩猎场上的生擒猛兽以及杂技技巧的高难动作，都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足球运动在战国时期本来是与斗鸡、走犬一样的娱乐活动。到了汉代，由于练兵的需要，发展改造成为有规则、有场地设备的比赛足球。足球场“左城（台阶）而右平”（刘歆《七略》），建设得象一座小城。足球比赛的激烈程度象打仗一样，“僻脱承便，盖象兵戎”（何晏《景福殿赋》）。足球运动不仅在军中普遍开展，而且普及到“家以蹴鞠为学”（《会稽典录》）。这反映了社会勇于改革的精神和伟大的气派。汉代摔跤已向多形式发展，击剑技术具有多种风格和流派。当时写成的体育单项的专业书就有《蹴鞠二十五篇》，《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和各种《射法》百余篇。

大唐帝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胸怀开阔，意气风发。唐代的体育发展具有雄伟、广阔、健美的特点。马球是唐代社会广泛开展的一个体育项目，上自皇帝贵族、文人学士，下至武夫走卒、宫女市民，大都喜爱此种运动。马球虽和军事练武官一定的关系，但比赛激烈勇猛，使“壮士欢呼”，“武夫生爱”（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这也是唐代人喜爱它的原因。至于摔跤、足球均是节日的娱乐活动；射猎、击剑为文人之所好；拔河集千人为两队；健舞具雄美之特色；要之，都能表现唐代体育雄伟、豪放的风格，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精神面貌。

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大的城市。为了满足城市人民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城市中修建了娱乐场所，并有各种技艺的表演艺人。体育的许多项目成为市民的娱乐内容，并有了大批的专业艺人。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书记载，仅南宋临安城一地，摔跤（相扑）、足球（蹴鞠）、弄水（游泳）、举重、使棒、放风筝以及杂技技巧的专业表演艺人，就有一两百余人之多。由这些专业艺人推动，宋代体育项目的技术发展是高超的。在钱塘江大潮汛中弄潮，在船头上荡秋千跳水，以及踢球中各种花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它已逐渐脱离了体育活动的自娱性和广泛性，走向专业化的道路，打上了体育商业化的烙印。这一特点，也和宋代社会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具有相同的性质。

明、清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严妨人民练武，实行军民分离的募兵制，禁止人民私有武器；又提倡理学，重文轻武。致使我国古代许多具有练武性质的传统体育项目，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甚至断绝；体育运动和它所在的社会时代一样，已是奄奄一息了。但导引、气功却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科学健身的太极拳运动。在反抗统治者压迫深入的同时，武术进入民间，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有人说，体育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窗口。从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体育发展面貌，不是也能看到各个时代社会精神面貌的一斑吗？

本书是知识性的读物，不可能全部罗列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体育史料和文物，也不可能对体育史学界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作详尽的阐述，它只能就作者浅

薄的知识和粗陋的见解，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古代体育话

一 体育的起源

关于体育的起源，世界上的体育史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是由于各人的观点、认识不一样，对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看法也就有了差异。

体育首先是起源于劳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书中说：“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不断改善和创造生产工具，并改善了本身的生理机能，完成了从猿到人这一漫长时期的转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体育在内。恩格斯在同书中还说：“只有劳动，人的手才能得到高度的完善，在这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尔德森的雕刻，以及柏格尼尼的音乐。”体育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运动也需要灵巧的双手才能完成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从这个广义来说，体育起源于劳动。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到诗歌的起源时说：“假使那时候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都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诗歌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体育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原始人类为了获取小动物作食品，就要有快跑的能力；为了抵御和擒获大猛兽，就要有使用器械和投掷的力量；为了捞取水中的鱼虾作食物，就要会游泳技术；为了采摘高树上的果实充饥，就要掌握攀登的技巧。当人类在劳动中认识这些能力和技术的重要，并有意地学习去锻炼这些技能时，就开始有了体育。最初的体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是相一致的，很难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只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劳动方式逐步改变，才能区分开劳动技术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差别。而追本溯源，最早的许多体育项目是从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跑、跳、掷、游泳和攀登，只是体育项目中的一部分。还有部分体育项目是社会的娱乐活动，如杂技技巧、舞蹈、秋千、拔河和球类游戏等，都是人类在生产有了提高，生活资料逐步丰富，能够得到温饱之后，为寻求休闲时的娱乐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原始时代都创造了自己的舞蹈。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祭神的娱乐活动中产生的。埃及原始人的壁画中有球戏图形。我国古代传说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足球游戏，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发现了大批的石球和陶球（图版1）。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到，处在原始生活的易洛魁人，在没有任何外来输入的条件下，也有球类游戏。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的唐尧时代，创造了一种击壤游戏，这一切都说明了体育的部分项目起源于娱乐。体育是人类精神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跑、跳、掷、游泳、攀登，虽起源于劳动，但是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更迅速的发展。人类在进入畜牧稼穡的生活阶段之后，和野兽拼搏的机会少了，而在争夺财物的战争中却需要发展身体能力，如追击对手的奔跑速度，搏斗的身体力量，准确的投掷技术，以及弓箭的使用能力，都较之人与野兽的斗争要求更高。这就使作为渔猎时代劳动技能的许多体育项目，在社会进入畜牧稼穡生活之后，不仅没有废弃，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扩大，又创造出更多的属于练武手段的体育项目，如举重、摔跤、驭车、武艺、足球、马球等。这些项目经过流传演变，都成为体育竞赛活动。在世界性的体育项目中颇多这类情况，如拳击、击剑、策马等，显然都是由军事训练手段转化而来的：至于射箭、射击和现代五项（游泳、越野、射击、击

剑、马术)运动的兴起,则明显地带着军事性质的痕迹,体育的许多项目和军事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说明了体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战争也有关联。

当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通过娱乐活动的实践,就认识到舞蹈(图版2)可以“利关节”,治疗“筋骨瑟缩不达”(《吕氏春秋》)。但这只是感性的认识,还缺乏科学的限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人类逐步认识了人体生理的奥秘,懂得“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自然哲理,于是就创造了导引、气功、按摩等健身练身的方法。其后通过实践,人们也认识到练武和娱乐的许多项目,也能起到“健身娱神”的作用。这说明了,体育某些项目的形成和发展,又是和社会文化科学紧密相连,是科学发展的成果。

体育是一种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从它的起源和发展中,就表现了它的特殊的社会属性:它不从属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部分,而又是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体育是适应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特别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我们只有如此认识体育,才能正确估价体育的社会作用。

二 足球

（一）黄帝作蹴鞠的传说

足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鞠是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蹴蹋以为戏乐。

最早记载了足球活动的书是《战国策》。此书记载：苏秦当了赵相，为了联络齐国共同抗秦，他对齐宣王说：齐国是一个大国，有二千里土地，数十万军队，仅临淄一个城市就有七万户，人民富庶殷实，都喜欢以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为乐。这样的富强国家，怎能俯首听命于秦呢？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时，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我国的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就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足球活动。

《战国策》上记载的是足球活动开展的情况，而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早些。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写道：“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距今约五千年，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五千年前有没有创造足球游戏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陕西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很多磨制很光滑的石球。这些地区正是当年黄帝部落游牧的地区。实物和传说正相吻合。在原始社会，人类有创造游戏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处在原始社会的部族时代，就有球戏；我国唐尧时代也有一种“击壤”游戏。黄帝时代当然也有可能创造简单的踢石球活动。

无论是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都说明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国际足球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说：“足球发源于中国”。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二）汉代的蹴鞠与《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临淄城的人们，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活动的。以踢球为娱乐，在战国时期，不仅只是齐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有楚国。《西京杂记》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大公，原出身于楚国沛县丰邑的庶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大公和刘温接到了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养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豪华的大厦，看的是歌舞伎乐，但他对此并不满意，整天闷闷不乐。于是，刘邦派亲信到刘大公处打听，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败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一天工作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蹴鞠：而现在住在未央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总感到不是味。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在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从此，太公又“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这座新城，后来就被命名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潼县的新丰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写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

康庄驰逐，穷巷蹋鞠”。

《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汉武帝的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阳和陕西绥德的汉画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图象（图一）。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在汉代，人们认识到足球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据何晏《景福殿赋》中说：“（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这些记载都说明，在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足球由社会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活动。

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汉代的兵书共有四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

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唐朝人还看到过此书。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域说就是讲球门建筑规格的，仅此一篇，就可见全书内容的详尽。如果《蹴鞠二十五篇》能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对汉代足球运动的研究必将提供丰富的资料。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面有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手段，足球当然要受到汉代军事家的重视。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远征塞外，在缺粮的情况下，还要进行踢球比赛。在实行征兵制度的汉代，人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作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人民的重视。《会稽典录》上说：“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由此可知，汉末开展足球活动已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

（三）唐代足球改革和女子足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的制球工艺，有两大改进：一是把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气球。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较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体的改进，带来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术的改变。汉代因为球是实心的，不能踢高，所以球门是就地建筑，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高球门的射门，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国古代的人们有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都要郊游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唐人康骅写的《剧谈录》中记载了一个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看渐众”。这个三鬟女子能够接住军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着木屐，一脚把球踢了数丈高，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于此可见当时足球活动的普及。

（四）宋代的圆社与《蹴鞠图谱》

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北宋时确有个圆社高俅，也确是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的大官，这事记在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元钱选绘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礼仪中规定，朝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怀酒之后，足球艺人便上场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会上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此外，宋代社会还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帮闲混饭吃的。刘邢在《中山诗话》中写了一个类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秀才，踢得一脚好气球。他的官运不亨通，几年选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谓喜欢踢球，便想走这条门路获得一宫半职，但又拿不出钱财贿赂丁谓的门房求得接见。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谓家球场的墙外。一天，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柳

三复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还丁谓，管门的人只好让他进去。他见了丁谓之后，把手中的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球一直未坠落在地。丁谓看了这种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复也就在哈哈大笑中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高俅和柳三复都是踢球艺人中的幸运儿，靠皇帝和官僚的赏识，得了官职。而广大的踢球艺人却是在社会压榨和饥寒中挣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级，对踢球艺人是看不起的，称他们为“贱人”、“寒贱之子”。虽然在喜庆宴会上、踢球艺人的表演给官僚贵族们带来欣赏技艺的欢乐，但官僚贵族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对踢球艺人制订苛刻的罚则。罚则规定：凡是输球队的队长，要在脸上抹上白粉，并挨麻鞭子抽打。两队比赛，总是一输一赢，输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后，还要受一番羞辱，这真是非人的生活。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圆社的人数可能不少，许多历史文献上都有“天下称圆社”的记载。由此看来，圆社是全国性的踢球组织。

宋代由于对足球运动的重视，足球运动相当普及，有关一些著述，如《蹴鞠图谱》、《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就是宋人撰写的。《蹴鞠图谱》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广记》的作者是陈元靓。这三部书中都用许多专业术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我们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断绝之后，这些专业术语已有许多难以辨识。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最受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自发士夫怜，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蹴鞠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证明。踢球之所以成为老少欢迎的娱乐，是因为这种娱乐既使人“精神爽”、“消长日”、“度永年”；又可起到强健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即“健体安身可美”，“肥风瘦瘠都罢”。“得此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此外，还可以“善诱王孙礼义加”，即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年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娱乐、健身和培养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分的认识，这对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当然会起极大的推进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自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共有几百个之多。《水浒传全传》上写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个鸳鸯拐”。鸳鸯拐就是个花样动作，是用左右外脚踝踢球。描写高俅给宋徽宗表演踢球时，“那气球似膘胶一样粘在身上”。这就是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关于我国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许多史籍的文字记载外，在一些文物图象上也有反映。如登封县少室石阙上有踢球图，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图”

(图版3),元刻《亭林广记》上有蹴鞠图(图二),元代“足球纹铜镜”(图版4),元钱选画《宋太祖蹴鞠图》(图版5)等。这些文物图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足球活动开展的面貌。特别是“足球纹铜镜”图象,在研究元代足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足球纹铜镜”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这是一件以体育活动为花纹的罕见珍品。铜镜背面浮雕的图象,是一对青年男女对面踢球,女子高髻笄发,作赐球状。男子戴幞头,着长服,半蹲膝,身稍前倾,作认真接球姿势,小球介千起落之间,球身隐约可见爪棱状痕迹,其形态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败与灭绝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婬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皮做烟眷。”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撒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图版6),《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图版7),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图三)。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泊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

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旁。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趣。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能不趋向灭绝。

我国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便灭绝了。但是，几千年足球运动的影响，在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清代冰上足球的开展，是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旁系。我国北方民间还有踢石球活动。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遗迹。

三 马球

（一）唐代皇帝喜爱打马球

马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击鞠、击球或打球。《宋史·礼志》上说：打球是一种军中的礼节，每年三月，在大明殿举行赛球典礼。皇帝乘马到球场，臣下迎接，依次上马。皇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皇帝打进了第一个球后，才叫诸王大臣开始比赛。

唐代是我国马球盛行的时期，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大多都“以此为乐”。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在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墓道两侧有五十多幅完好的壁画，《打球图》就是其中的一幅（图版8）。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二十余匹骏马，体态丰满，细尾扎结；骑马人头戴幘巾，脚穿长靴，手执鞠杖；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高举鞠杖，侧身向后击球：球在场中滚动，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抢。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唐代打马球图青铜镜，图像十分逼真（图版9），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打马球俑（图版10），其形象也非常逼真。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社会喜爱马球活动的风尚。

马球起源于何时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起源于波斯，由波斯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入长安；一种认为起源于吐蕃（我国的西藏地区），向东西方传播；一种认为在东汉后期我国就有了马球，马球是由汉代的足球发展演变而来。这几种说法，都还不能论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唐代马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盛行三百年而不衰，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我国古代的骑兵虽创始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兵种。到了南北朝，盛行甲马，就是给马匹穿上防护的甲具，俗称为铁骑。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成为轻骑兵，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因此，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新唐书·兵志》记载，“自（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天宝后，“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马匹是建设骑兵的基础。有了马匹，还要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马球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百马蹁蹄近相映，欢声四合壮士呼”。无论是参加打球，还是观看比赛，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开元之时，天下富庶，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闲的娱乐。于是，马球运动就成为社会欢迎的活动了。作战的军士要练武，闲暇的富民要娱乐，这就是唐代马球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社会原因。

唐代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唐代上层社会的喜爱和重视。唐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大都是喜爱马球活动的。“上有好看下必有甚焉”，这是社会现象的一条规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宗条下，就有这样一句话：“上好击球，由此，通俗相尚。”唐代马球运动的发展，和皇帝的倡导亦有关系。

《唐书·本纪》中，常常有皇帝幸某处击鞠的记载，说明唐代皇帝大都

亲自上场打球。唐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据考古材料，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石志上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图四）。说明含光殿球场的建筑年代在大和辛亥，即唐文宗五年（831年）；同时也说明，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用的。由于经常参加打球，有几代皇帝的球技还很高超。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侍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他可以考中状元。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唐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唐玄宗二十四岁时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球赛，表现突出，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赛赢得了胜利。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吐蕃是游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与之比赛，两战都输了。唐中宗十分恼火。这时，唐玄宗还是临淄王，他和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族马球队，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开赛之后，唐玄宗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连连透门，贵族队大获全胜。球赛之后，吐蕃大臣尚赞咄连连称赞说：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

唐玄宗一直到老年还是十分喜爱打球，天宝六年，他已六十二岁了，还想参加球赛，经别人劝阻，才坐在场外观看。究竟是因他喜爱马球，坚持了体育活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唐玄宗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七十七岁。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也算是长寿的了。

唐玄宗晚年，意志衰退，耽于宴乐，不问政事，导致了安史之乱。宋人李公麟绘了一幅《明皇击球图卷》（图版12），晁无咎在画上题了一首意含讽刺的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把祸乱的原因归罪于打球，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青年时期的唐玄宗不是更热衷于打球吗？但是他开创了开元盛世。适时的娱乐并不会影响政事，何况是有助于社会尚武、练武的马球运动呢！

（二）月灯阁下打马球

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唐代马球受到军队各级将帅的重视。节度使的驻地，都建有训练用的马球场，并经常修整锄草便于马匹奔驰。左右神策军是皇帝的警卫部队，其驻地也是经常陪皇帝打球的地方。因此，神策军就更重视马球活动。唐代许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军中，并因球技高超而有好几个人升任了节度使。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有一次是用打球输赢来选拔节度使。广明元年（880年）西川节度使出缺，神策军中大将陈敬瑄、杨恩立、牛勣、罗元果四人都想去当节度使。唐僖宗无法决定，便叫他们四人赛球，谁赢了谁当节度使。结果，陈敬瑄夺得了头筹，便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

唐代文人当然没有武将的马球技艺高。在文人中也不会象军中马球开展得那么普遍。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会打马球的。进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荣的出身，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文人都希望由进士科走入仕途。而进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会，即慈恩塔题名、曲江游乐宴会和月灯阁下打球。这是文人夺得鳌头后最得意的活动。如不会打球，岂不使盛会扫兴。

因此，唐代文人由文入武，当了节度使的也不乏其人。如诗人李绅、高适、张建封，都由文人武当上了节度使。当了节度使就要训将练兵，就要会打马球。所以，张建封在他的诗中说：“仆本修文执笔者，今来帅领红旗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文人入武，首先就要会打马球。上述两种仕途都促进了文人中的马球运动。

唐代个别文人，马球技术也很精湛，还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呢。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月灯阁下打球的故事：晚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新进士集会在月灯阁，准备赛球，场外已围了几千观众。突然，有几个神策军闯进了球场，手拿球杖，策马奔驰。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晚唐时期，朝廷政权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而左右神策军就是宦官手中的两把刀子。虽然这次是无理取闹，新进士也不敢公然得罪他们。但这天的盛会，是新进士出头露脸的大喜日子，如果在几千观众面前输了球，是很丢脸的。正在为难之时，有一个新进士叫刘翬的挺身而出说：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向在场的几个神策军拱手道：新进士刘翬，特来奉陪练球！这几个神策军见有人应战，便拿出球子与刘翬比赛。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球子便被刘翬夺得。他只有一个人，无法传球，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一个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子飞出球场，不知落到何地去了。这几个神策军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高超的球技，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一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在几千名观众的嗤笑声中，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

（三）球场锄奸与唐敬宗被杀

唐代的官僚贵族，也多是以打球为乐的。封建官僚贵族的娱乐，常常和奢侈浪费联系在一起。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场；为了使马跑后不扬起尘土，在一千步长的球场上，用油和泥建筑。五代时的吴王杨渥，喜欢在夜间打球，球场四周点上几十根蜡烛照明。一根蜡烛有十围粗，每天耗费数万钱。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郭英又家中养女伎骑驴打球，驴身上的鞍饰及人身上的服装，也要用去数万钱。这真是豪门一场球，贫民几岁秋。

官僚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无事生非，球场中的风波也会变成政治斗争的恩怨。据《新唐书》记载，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魏博节度田承嗣的女婿。有一次，李宝正和他的内弟田维打球，不慎冲撞了田维，使田维堕马身死。田承嗣大怒，囚禁了李宝正。从此两家结下了十几年的冤仇。刘悟本来是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一个部将，在一次球赛中，刘悟的马头撞了李师古的马；李师古很生气，要杀死刘悟，后因别人劝解而罢。但刘悟却从此怀恨在心。李师古死了之后，刘悟杀了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自己当了淄青节度使。另据记载，黄巢的部将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当了唐朝的节度使。他派儿子朱友伦在长安城做监军。在一次球赛中，朱友伦不慎坠马而死。朱温以为是别人有意谋害，便杀死了唐朝许多旧臣来报复。

阴谋暗杀，是封建官僚贵族争权夺利斗争的一种手段。在唐代的马球场上也曾发生过两起谋杀未遂的事件。李忱是唐武宗李炎叔父，李炎想杀死他，但又不便于公开下手，便派人借球赛的机会阴谋暗害。由于李忱骑术精良，球技高超，才逃过了毒手。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委以三镇节度使的重任。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早已窥见安禄山的叛逆野心，几次想借打球的机会杀死

他。终因唐玄宗百般袒护而未能如愿。

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率兵叛乱，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沦入叛军之手，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抗战派，坚持在敌后抗击叛军。但是，兵少粮缺，形势非常险恶。正在艰难困苦之际，常山太守王侁动摇了，和叛军副师史思明书信往来，勾勾搭搭，准备率部投降。常山太守部下的军官都是有正义感的汉子，不愿向叛军投降。但王侁的投降行为尚未明朗，不便反对：如他的阴谋一旦成为事实，又有叛军作为外援，则又很难对付。于是，十几个小军官就借赛球的机会，撞倒了王侁的马，另十几骑随后一拥而上，风驰电掣般地跑过，把奸贼王侁踏得尸骨如泥，血染黄土，粉碎了这次投降的阴谋。

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时，河北镇有个姓夏的军官，骑术精良，武艺超群，能拉开几百斤力的弓，尤其精通马球技术。他曾在马球场上，作过一次飞马打球的特技表演，在球场的地上累了十几个铜钱，他飞马奔驰，用手中的球杖击钱，一次只击一枚，而且这一枚铜钱只飞出七丈远，十几枚铜钱，个个如此。击钱的准确程度达到了神奇的地步。如用这种本领在球场上射门，当然是百发百中了。

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内园也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打球供奉”的记载。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但在皇帝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据《资治通鉴》记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来潮，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李湛。在警卫重重的皇宫中，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当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一部分义军，摧毁帝国的统治，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锢的皇宫中，敢于拿起武器，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这种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

（四）天下承平不忘练武

唐代人的诗文中对社会上的马球活动记载颇为详尽，但是有关马球比赛的方法规则记述甚少。《宋史·礼志》和《金史·礼志》在这方面却有较详尽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唐、宋时期的马球运动已具备了较完整的规则。而比赛的方法则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唐代采用双球门，南宋、金国和以后的明代则是用单球门。这种改变，可能受当时足球运动方法的影响，也和社会的习俗风气有关。双球门的比赛方法激烈，直接对抗争夺，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单球门是在一个门前争夺射门，危险性就小得多了。这就促成了改革。但马球运动的这种改革也与足球运动一样，在训练体力和意志上，都是一个退步。